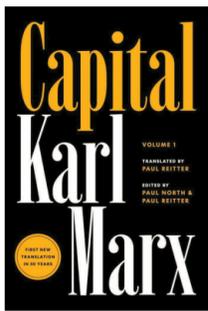


资讯

# 思想史进路的 《资本论》英文新译本

■ 编译/黎文

一部新的《资本论》英译本近日推出，由保罗·赖特(Paul Reitter, 俄亥俄州立大学日耳曼语言和文学教授)翻译，他与保罗·诺斯(Paul North, 耶鲁大学莫里斯·纳坦森德语教授)共同编辑，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汇为评论和注释。今天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资本论》英译本？译者和编者如何看待之前的译本？“文汇学人”结合他们在《思想史杂志》(jhiblog)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次采访，及新译本中“在21世纪重新翻译《资本论》”一文等材料，择要介绍。



▲ 保罗·赖特译，保罗·诺斯与保罗·赖特编辑，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4

▲ 1866年，马克思在马尔盖特



第615期

## 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座“花岗岩纪念碑”

《资本论》的上一版英译本是1976年出版的本·福克斯(Ben Fowkes)译第一卷。它诞生于19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西欧罢工以及年轻一代排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背景之下。对于时隔半个世纪的新译本，保罗·赖特表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已有许多人在讨论马克思，《资本论》拥有了希腊语、意大利语、波斯语、葡萄牙语和日语等新译，因此他们觉得对马克思与当代政治经济的相关性无需再赘言，而新译本项目的起步有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对“市场”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怀疑；我们认为，现在正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最全面、最有力批判的时候。”

作为思想史学者，新译本的编者与译者关注马克思思想和文体的流动性和变化性。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以坚硬稳定、精准连贯著称，但随着档案和手稿的不断开放，以及“语言学转向”的发生，学者们认识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一座“花岗岩纪念碑”，而总是处在不断的演进之中，比如他会自创各种新词，还有修改或改若千版的手稿，他是一个独具风格的写作者。“他总是尝试回应新的社会情境，也总是努力去弄清楚自己真正想阐明的内容。”

新译本力图通过更自然、更口语化的翻译，希望让人认识到马克思很幽默，而且是个了不起的演讲作家——这本书里有很多文章都像面对工人集体的演讲。虽然为使写作达到简洁，他会使用“压缩”手段，但也会冷不丁开个玩笑，比如“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译者表示：“《资本论》可以让你放声大笑！”

## 《资本论》的版本与译本

按阿根廷裔墨西哥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的计算，如果把马克思的所有手稿都算上，第一卷只是整个《资本论》的1/72。《资本论》从各个不同角度考察“资本”。第一卷是关于生产的，第二卷是关于流通的，第三卷是关于整个系统的，包括银行、信贷、利润率等。

第二、第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第二卷是由恩格斯试着将马克思在15年间写的八份不同手稿融合成一份文本。第三卷以一份手稿为基础。

在保罗·赖特与保罗·诺斯看来，第一卷既是经济学、评论、社会理论，又是一部19世纪的小说，可以说最为有趣。《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一版(1867)，只有第一章被

译成英文。德文第二版(1872)是马克思本人编辑和批准的最后一个版本，即本次译者选择的底本。德文第三版(1883)，第一次英译由塞缪尔·摩尔(Samuel Moore)和爱德华·阿弗林(Edward Aveling, 马克思的女婿)于1887年完成。德文第四版(1890)的英译本于1928年问世，由伊登和西达·保罗(Eden and Cedar Paul)翻译。保罗夫妇主要希望在可读性方面超越摩尔-阿弗林版，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得到当时马克思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戴维·里亚扎诺夫(David Riazanov)的认同。他写了一篇非常负面的评论，保罗夫妇的译本从此一蹶不振。本·福克斯的1976年译本也是基于第四版。

马克思在1872至1875年期间还参与翻译了《资本论》法文译本。他投入大量精力修改约瑟夫·罗伊(Joseph Roy)的译文，并表示他同时也对文本本身稍作修改。他声称法文版是他监督出版的《资本论》的最后一个版本，有其自身的“科学价值”，他还列出了未来版本(包括德文版)应从法文版翻译的段落清单。恩格斯虽然致力于执行马克思的指示，但在第三版和第四版中却遗漏了马克思清单上的许多条目。此外，学者们列出法文版中具有独立科学价值的段落，都不在马克思的清单上。且对于其中一些关键段落，尚不清楚马克思是在修订，即表达自德文第二版出版以来他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还是在随手翻译。“我们也不清楚这些段落是出自马克思还是罗伊，因为我们没有马克思修改过的罗伊译本的手稿。”

## 几个词的翻译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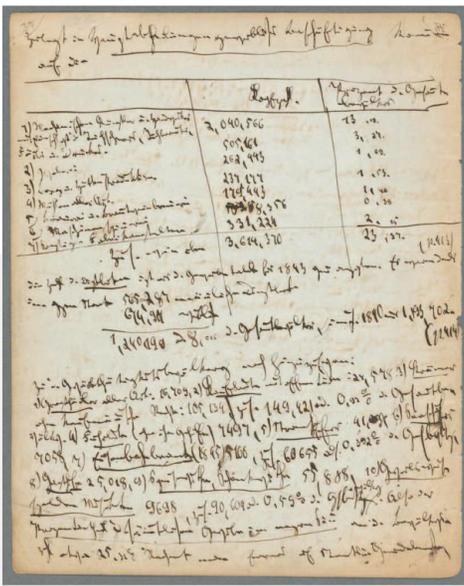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使用了一些即使在德语中听起来也很奇怪的新名词，目的是反映“资本主义如何使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不自然，与人类的繁荣发展不相容”。赖特在阅读福克斯的译本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形式上的对等：当有一个英语词汇与马克思使用的德语词汇相似，或在词源学上一致时，福克斯倾向于选择这个词。例如，马克思使用“vegetieren”，福克斯就会使用“vegetate”；马克思使用“Hintergrund”，福克斯就使用“background”。同样，福克斯在尽可能保留马克思句子结构(即分句顺序)的前提下，将大多数名词翻译成名词。这种策略可以让读者体验到原文的某些方面，但也有其弊端——与马克思所使用的词最相近的英语词汇，或者从词源学上与马克思的词最吻合的英语词汇，往往不是最佳的语义匹配。

新译本致力于呈现马克思散文文体的流动性，并保留其幽默感(这两样东西对他的批判具有多重功能)，并力图谨慎、周全地呈现马克思的概念。赖特举例说，如果看看其他译本是如何翻译马克思作为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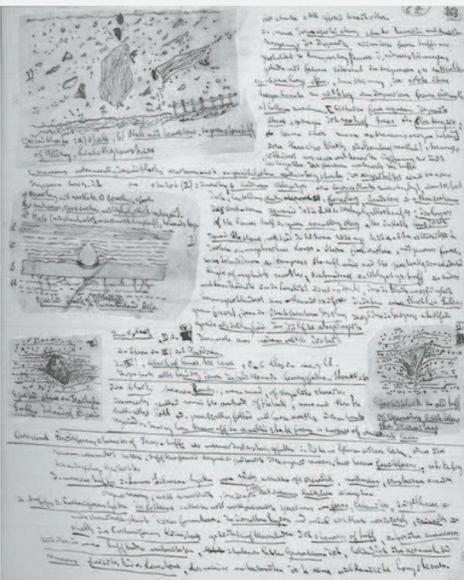
念范畴使用的“sachlich”一词的，就会发现，它们首选的译法“material”和“physical”有时并不符合逻辑。例如，在第一章拜物教性质段，谈到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如何以劳动产品等同的“Werthgegenständlichkeit”(价值对象性)的“physical形式”(物的形式)出现。由于“Werthgegenständlichkeit”是一种纯粹社会性的东西，因此很难理解它的形式如何会有形的。

还有，以前的英译本将德语“Korn”译为“玉米”，新译本作“小

麦”。Korn在德语中意为“谷物”，用于制作面包等主食。也即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一种性质不同、经济上至关重要的产品。赖特说，当年的德国或英国即使有玉米也不会很多，玉米不是主食。当时，小麦是全球的主食，就像现在一样。他强调这一更改不是为了精确而精确，而是因为，马克思用于论证的商品应该是那些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商品，在小麦这件商品上还需要进一步构筑的论证，因此这一改动十分必要。



▲ 马克思为《资本论》做的计算，1860年 现藏纽约公共图书馆



▲ 马克思的地质学笔记

均资料图片

# 现代上海的法式沙龙

■ 狄霞晨

分属东西方文明的中国和法国历来重视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上两国之间曾展开丰富活跃的人文交流。近代以来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更是见证了中法之间在思想、文学、音乐、美术、建筑、城市景观乃至生活方式等多个层次的相互对话、相互影响。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借此机会，笔者试图对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法式沙龙做些回顾。

## 马斯南路的“真美善”沙龙

1927年，随着“真美善”书店的开设，沪上首个“法式沙龙中心”诞生于马斯南路(思南路前身)曾朴客厅。曾朴诚挚欢迎沪上文艺青年尤其是法国文学爱好者来访。他在自传中写道：“马斯南路的客厅里到了晚上没有一晚不是灯光耀目一直到深夜的。”

“真美善”三个字本是法国浪漫主义者标榜的口号，曾朴父子亦以此作为号召，希望“借此拉拢一些文艺界的同志，朝夕盘桓，造成一种法国沙龙的气氛”(《曾朴全集》)。来访者多是声气相投的文艺爱好者，张若谷、徐蔚南、郁达夫、田汉、赵景深、叶圣陶、陈望道、朱应鹏、江小鹁、苏雪林等都是座上客。一群青年围绕着“老少年”曾朴，讨论法国浪漫主义、沙龙文学、路易十四朝的国韩文会、乔治·桑等法国作家的轶事、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布鲁内蒂埃的反对理论等法国文艺话题。不少中国作家都因各自的法国偶像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跨文化身份：曾朴和曹白被誉为上海的“仲马父子”，徐霞村被视为上海的皮埃尔·洛蒂，而张若谷则是上海的阿纳托尔·法郎士。

“真美善”沙龙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法国文化爱好者中心，不仅因为其主人是一位醉心法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者，与其坐落的位置亦密切相关。在搬到马斯南路之前，“真美善”编辑部也曾门庭冷落。为了让自己的沙龙有地道的法国味，曾朴租下马斯南路一座有客厅、有花园的洋房作为编辑部。尽管租金高昂难以承受，曾朴却总是舍不得搬。为什么呢？他在《异国情调》序中道出原因：

“就为马斯南路是法国近代的制曲家，我一出门，就要想他《拉霍尔王》、《少年维特》的歌剧。再在夕阳西下时，散步在浓密的桐荫之下，左有高耐一街，不啻看见《西特》和《霍拉斯》悲壮的布景，右有莫理爱街，好像听见《伪善者》和《厌世人》的苦笑，前面横贯新拉斐德路，在法国原有好几个拉斐德，我却只认她是和赛妮尼有关系的作家，就想像她《葛兰佛郡主》里绘画的风景，《趣味的笔记》里叙述的故迹。我在花园里，就当她是鲁森堡，我踟蹰在霞飞路，就当她是霜霞莉蕊，这些近乎疯狂似的 Exotisme(异国情调)，就决定了我的不搬家。”

曾宅坐落于旧法租界中心地带，往北走五分钟即是1909年由法国园艺师柏物设计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大草地、玫瑰园、喷水池、冷浴室一应俱全。给曾朴带来法国文艺灵感的高耐一街(皋兰路)、莫理爱街(香山)、拉斐德路(复兴中路)、霞飞路(淮海路)也近在咫尺。如汉学家傅海鸣所言：马斯南路115号曾宅优雅的周围环境能够唤起对巴黎生活的遐想，可以勾勒出充满美感的法国生活画面。张若谷也对曾宅住宅及其周围的三条路——高耐一街、莫理爱街与马斯南路——赞不已：“这三条点缀都会艺术文化的法国式道路，恰巧又都是采取艺术家的名字做路名，真是何等美妙风雅。住在那里的人家，即使是大量商贾，或俗夫俗子，也会渐渐地带艺术化起来的吧。”作为上海衡复历史风貌区中的保护建筑，这份法式优雅被保存至今。如今的曾宅位于思南路公馆内，周围都是外观相仿的小洋楼。花园里绿树环绕，鸟雀成群，不想像近百年前“真美善”沙龙的风雅。

## 由上海及江浙的“文艺茶话”

随着1931年7月《真美善》杂志的停刊与曾朴的归隐，马斯南路的客厅沙龙成为了历史，但上海的法式沙龙并未停歇。1932年，法国归来的徐仲年、华林、孙福照作为主要成员创办了“文艺茶话”，每周日在上海举办，出版同名杂志。徐仲年是里昂大学的文学博士，而华林与孙福照则专攻艺术。“文艺茶话”的倡导者与曾朴志同道合，延续了法国文艺客厅的形式：

“在斜阳西下的当儿，或者是在明月和清风底下，我们喝一两杯茶，尝几片点心，有的人说一两个故事，有的人说几件笑话，有的

人绘一两幅漫画，我们不必正襟危坐地谈文艺……文艺空气，流露于不知不觉的谈笑中，正如行云流水，动静自如。……舒适，安乐，快心。它是一种高尚而有裨于知识或感情的消遣。”(衣萍《谈“文艺茶话”》)

比起“真美善”沙龙，“文艺茶话”规模更大，地点更灵活，形式更多样，成员背景更为丰富。例如，在1934年2月18日下午举办的第八十七次“文艺茶话”中，24位沪上文艺精英齐聚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茶点部，共同欢迎意大利画家佳露·查农前来交流。查农之妻是法国人，徐仲年与查农夫妇相识已久。除了徐仲年、华林、孙福照这三位沙龙骨干之外，汪亚尘与郎鲁迅是从法国学成归来的美术家，马宗融是毕业于里昂大学的文学翻译家。24位中，有卢葆华等8位女士出席，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文艺茶话”之风也从上海吹到了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例如，南京首场“文艺茶话”特意选在南京的“上海咖啡店”举办。戏剧家谢寿康不仅从法国带回了文艺客厅的布置灵感，还邀请了法国归来的刘石心、唐学咏、方子、侯佩尹、章警秋、郭心雄等文艺家。到场的还有孙德工王梅痕夫妇、费黛熙、胡小石、王道源、钟宪民、蒋山青、顾阴亭、薛天汉等文人士。主催者王平陵在那一天异常忙碌，据他回忆，南京先生太太们都保留着东方人客气的习气，他得一一地介绍，替大家打破社交隔阂，才使他们在这轻松自在的法国艺术空气中，放下东方人的客气与拘谨，自由地交谈、说笑。顾、薛二位大大现场表演了昆曲，方女士演唱了法国歌曲，唐学咏则唱了自制歌曲。中法曲艺同台展演，令人难忘。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除了曾朴的“真美善”沙龙与徐仲年等人的“文艺茶话”之外，还有美国名媛弗里茨太太的沙龙、新雅茶室沙龙、张若谷主导的“咖啡座谈”等诸多文艺沙龙，各个沙龙成员之间多有交叉。与同时期的北京沙龙相比，“对法式异国情调的迷恋、对沙龙文学国韩文会的热衷可以说上海沙龙的重要凝聚点”(费冬梅《沙龙》)。成为联结现代中国与法国文艺的桥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真美善》杂志一周年纪念号外：女作家号